

中国古代壁画历经远古时期的起源阶段,后随着佛教的兴盛,在魏晋至隋唐的艺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并在宋代至明清时期呈现出以世俗题材为主的多样性发展。这些壁画广泛分布于石窟、寺庙和道观中。其中,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山西的寺观壁画中均有精彩的乐舞与乐器图像出现,不仅充分展现出工匠画师们的精湛技艺,也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那些生动、丰富的图像,折射出中华音乐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中所展现出的丰姿音韵。



莫高窟第172窟中的乐舞场景(资料图片)。

展唐乐仪制

唐代壁画广泛分布于我国山西、河南、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湖北、广东等地,尤以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尽头的敦煌壁画自成一系。在敦煌莫高窟的数百个洞窟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变画、说法图和出行图,那些伎乐形象和乐队演奏场景仿若唐代音乐发展的缩影,为后人留下意想不到的惊喜。

第220窟是莫高窟极为重要的初唐洞窟之一。在其南壁的《阿弥陀经变》下部,是一派生动的乐舞景象。画面构图严谨,色彩瑰丽,乐伎16人坐于方毯之上,分为左右两组演奏,琵琶、笙、竖笛、箜篌、方响、排箫、羯鼓、横笛、答腊鼓、埙等弹拨、吹奏及打击乐器俱全。一对舞伎手持彩带,正在乐队中央的圆毯上翩翩起舞。同为《阿弥陀经变》,初唐第386窟南壁也有一处较大的展现乐队演奏场景的壁画,共分上下两层,乐伎达20人,姿态生动。其中,上层的12人分为两组相对而坐,演奏的乐器包括腰鼓、琵琶、笙、箜篌、笙、拍板、竖笛、横

笛、排箫、羯鼓、鸡娄鼓等;下层有8人,依然为两组相对而坐,演奏的乐器有竖笛、琵琶、拍板、横笛、腰鼓、笙等。此外,在推断营建于盛唐时期的第45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也可见7名乐伎。

纵观不同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初期营建的石窟中,所见乐队乐器数量较少,一般为3至5件,北周至隋代壁画中的乐器有10余件。至唐代,壁画中的乐器数量和种类繁多,且乐舞内容增加,大型乐队的建制逐渐形成,乐器排布由分散变为集中。在北周至隋朝时期,乐队主要呈现出左右对称的排布结构,至唐代,出现了上下对称排布和同类乐器对称排布等多种乐队编排样式。

敦煌壁画中的乐队不仅折射出当时的音声供养方式,也成为唐代乐队排布形态和乐器构成最直观的印证。此外,在壁画中呈现的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箏篳篥、凤首箜篌、琵琶等乐器,均是天竺乐中比较固定且典型的乐器。实际上,壁画中不仅有龟兹乐队,还有坐部伎乐队和西凉乐队,生动反映出彼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莫高窟第45窟中的乐队形象(资料图片)。



莫高窟第220窟中的乐伎(资料图片)。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中的天宫伎乐(资料图片)。

呈民间礼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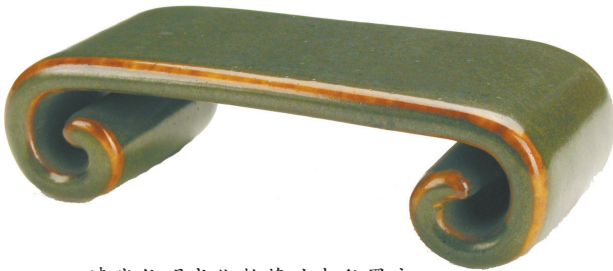
山西不仅保存有众多宋元明清时期的古代寺院、庙观建筑,同时也有大量珍贵的寺观壁画遗存,如永乐宫壁画、觉山寺壁画、崇福寺壁画、后土圣母庙壁画、青龙寺壁画、开化寺壁画等,其中大部分反映了当地民间信仰和传说故事,也出现了表现时代生活和审美喜好的乐器演奏场景。

如位于山西长治寺庄村的一处老庙窟,因寺碑损毁,其具体历史已不得而知,大致可推断为清代建筑。在其内壁上留有精美的彩色乐器演奏壁画,呈现出鲜明的文人画特征。画面仿照明清时期仕女画风格,背景中多饰有杂石、竹枝、花卉等,演奏者均为女性乐伎。她们演奏的乐器有环、秦琴、横笛、管、板、琴、笙、琵琶、箫以及八角手鼓。其中,环为打击乐器,由两中环、一大环组成,又称作“三环”,各环又套有三个小环,握把的端部一般装饰有彩穗,演奏者通过双手持握把摇动发出声响。秦琴,又称“梅花琴”,是中国传统的拨弦乐器,结构和阮

相似。其音箱由6或8块硬木板胶接成边框,呈梅花形、圆形、六方或八方形,两面蒙桐木薄板。琴杆窄长,上嵌十九品,按十二平均律排列。琴头则雕有梅花、如意、蝙蝠或铲头装饰。这组寺观壁画不仅展现了典型的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反映出画师的审美喜好与彼时的民间礼俗。寺观壁画对于传统文人画的借鉴,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文人画影响之大。

这组壁画的绘画形制,不由令人联想到比利时学者阿理福于1884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书中的一组中国乐器水彩插图,成为18世纪传播中国乐器形象的外销画代表作。这组插图作品的绘制并非画家的随意想象,而是参考了当时的仕女奏乐图像,画中所绘乐器皆是当时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明清时期的民间乐器已相对定型。出版物中对于中国音乐图像的记录,充分说明了中华音乐文化已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

(据《光明日报》)



清代仿明成化款茶叶末釉墨床。

院收藏的清代茶叶末釉墨床,呈长方几案状,高2.8厘米、长10厘米、宽3.7厘米,床面平坦,两侧为圆弧向内卷曲,形成案足,外观类似于宋代木案几样式。案面下有4个乳钉,左右案足下各有5个乳钉足,均呈青灰色。全器遍施茶叶末釉,釉色于墨绿中闪黄、闪褐;几案边缘部分则留有黄褐色轮廓线,如古旧家具经年形成的磨痕一样;几案下面中央刻有残缺阴文篆书“成化年制”4字2行款,是乾隆时期仿明成化年间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器物对应的磨痕,皆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清末出现了液体墨汁,还制作出储存墨汁的铜质墨盒,携带更为便利,加之良材几近殆尽、制作工艺渐显衰弱,墨床鲜见创新,渐从文房用品中淡出,开始失去实用价值,只作为艺术品收藏欣赏。

(据《中国文化报》)

寿山石雕 五子嬉佛



寿山石雕「五子嬉佛」。

寿山石雕,是福建省福州市地方传统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南宋时,寿山石矿已得到开采,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独立的寿山石雕产业最终形成,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寿山石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东门、西门两大流派。寿山石雕技法丰富多样,精湛圆熟,又在发展过程中广纳博采,融合了中国画和各种民间工艺的雕刻技艺与艺术精华。寿山石雕作品题材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

这件清代早期的寿山石雕“五子嬉佛”,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塑造的大肚弥勒形象,立体圆雕,红白石色相揉,高13.05厘米,弥勒佛箕踞而坐,袒胸露腹,满面笑容。5个童子于弥勒身上嬉戏,有的在掏耳,有的在挠脚,有的在揪奶头,有的在拽他的佛珠,有的正在敲打铜鼓,弥勒被童子们闹得嘴角斜翘,乐不拢嘴。此雕刻极为细腻,5个童子头上的发饰各不相同,或挽双髻,或单髻,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尤其是弥勒,青色的头皮上隐约可见细黑的头发,神态自如如神,笑出的皱纹也刻画得十分清晰逼真。衣纹流畅自然,沿胸襟嵌有红绿宝石,并巧用石色,色彩呈红白黑相间搭配,仿佛佛饰。此石雕构图精美,巧夺天工,反映了清代早期的寿山石雕十分讲究精雕细刻,并根据石色变异巧妙雕塑,使其达到色彩与构图的最佳效果,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雕珍品。

(据《联谊报》)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



1989年9月20日,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的一名农民在程家村茆背沙丘取土时发现青铜器,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新干商时期大型墓葬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这些青铜器铸工精细、特色鲜明,大量使用虎纹装饰,是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中伏鸟双尾青铜虎体积最大。

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厘米、通高25.5厘米、重6.2千克。其虎首平视,口张露齿,獠牙尖长,双目圆凸,眉粗横行,两耳竖张,背伏小鸟,腹部略垂,腹空无底,双尾曲卷,呈伏蹲欲纵之姿。虎身遍饰花纹,脸、腹部饰卷云纹,背部饰云雷纹,鼻面、正脊、尾部与四腿下部饰变形鳞纹,四腿上部则为醒目的雷纹。此虎造型奇特,工艺细腻,形象生动,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得极致。

新干商时期大型墓葬出土各种造型的虎有56只之多,蔚为壮观,丰富了我国青铜文化的内涵,为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据《中国文化报》)

明代瓷瓶寓意“平升三级”



该瓶高47.5厘米,通体以青花为饰,颈部饰山石蕉叶纹,腹部饰缠枝灵芝纹,底部饰蕉叶纹。腹部通景描绘官员身着官服,威风凛凛。待从双手捧瓶,内插三戟。

据介绍,“瓶”与“平”谐音,“戟”与“级”谐音,故而寓意“平升三级”,有着官运亨通的吉祥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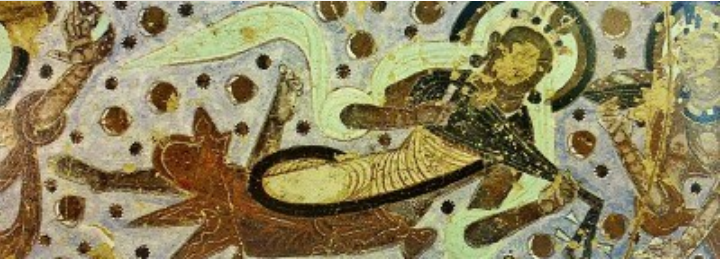
(据《侨乡科技报》)

高墙粉壁传清音

——赏古代壁画中的音乐图像



山西老爷庙壁画中的持环乐伎(资料图片)。



克孜尔杂哈石窟第30窟中的伎乐飞天(资料图片)。

墨床藏雅梦 文韵溢芬芳

中国文房供源远流长,文房诸具中,有一小小物件,谓之“墨床”,亦称“墨架”“墨台”,是专门用来承搁墨锭的小案架。

虽然墨床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但见诸历史文献很晚。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所述仅限笔、墨、纸、砚;南宋末年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将文房用品列为10项,并无墨床;成书于明初的《格古要论》将文房用具分为13类,也无墨床;明末屠隆的《考盘余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到45种,且功能明确,已有了笔搁、笔床、笔

船、墨匣、糊斗、腕枕,却仍无墨床。直到清代,墨床才始见于记载。清乾隆年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大量制造玉文具的记载,其中便有相当数量的玉墨床。

墨床多为木、玉、瓷所制,从传世的墨床来看,玉质墨床最多,也最为精致。目前所见最早的墨床为明代器物,明代由于制墨业繁荣,墨床也随之流行,大都线条劲挺、棱角分明,表面纹饰极浅,呈平面化,有的干脆制成光面,通体不加任何雕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白玉镂雕荔枝螭龙长方墨床,呈几案形,明代朴素浑厚之风极为明显。

明代墨床除玉质外,还有木嵌玉材质,但传世品极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紫檀木镶玉墨床,内嵌青玉片,玉色泛黄,并有大片白绺。全器似一部摊开的书卷,作两页面,一侧高,一侧低,玉片嵌于

较高的一侧书页上。

清代是案头文玩的鼎盛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也从古铜、玉质,扩展到紫檀、陶瓷、漆器、琥珀、玛瑙、翡翠、琅玕等。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紫檀雕“福寿富贵”纹墨床,整体为书卷状,面上凸雕团寿为主纹饰,四周环绕4个勾云纹,两侧分别浮雕蝙蝠和牡丹,蝙蝠的两翼与牡丹的枝叶相互呼应,组成对称的纹样造型,蕴含“福寿富贵”的吉祥寓意。紫檀纹理清晰,工艺制作精湛,可谓雅趣怡然。

清代玉墨床多为几案形,造型简单,线条圆润,床面多有纹饰,雕工与明代相比更为细腻、层次分明。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代青玉几式墨床,由青玉雕琢而成,形似案几,双足内卷,呈云头状。墨床面两端浅雕兽面纹,下附木座,造型优美,形制舒展,风格清雅,小巧精致。清代木墨床也多采用玉镶嵌床面,红白相衬,别有韵味。

清代瓷质墨床较多,最常见的是几案形墨床、笔架两用器物。沈阳故宫博物



清代紫檀雕“福寿富贵”纹墨床。